

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

论新时代中国负责任大国 形象的树立

王亚琪 吴志成

[摘要] 树立自信自立、胸怀天下、开放包容的大国形象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中国以自信自立为基点,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发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优良传统,既保持对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关系的正确认知,又通过自身发展筑牢承担国际责任的基础。中国坚持胸怀天下,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参与引领全球治理进程,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公正合理变革担当大国责任。中国坚持开放包容,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拓展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引导经济全球化向普惠包容方向发展,促进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中国始终把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坐标系中,坚定履行国际责任与义务,成为动荡变革世界的稳定力量和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中流砥柱,必将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关键词] 负责任大国;国家形象;自信自立;胸怀天下;开放包容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654/j.cnki.naf.2024.06.001

[文章编号] 1003-7411(2024)06-0003-(13)

[收稿日期] 2024-08-12

[基金项目]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TJZZQN20-001)

[作者简介] 王亚琪,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天津 300350);吴志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北京 100091)。

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国家形象对于提升国家地位、促进国家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1]国际关系研究对国家形象的早期探讨,就指向在物质权力之外,威信与声望对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作用。^[2]全球化时代,随着国家间相互依赖不断加深,除了本国的实力和利益,他国的认知、评价和情感也深刻影响国家对外战略的制定与实施,^[3]非强制性、非物质性权力得到国际关系研究的进一步重视。基于良好的国家形象,国家可以通过吸引而非强制或利诱获得他国的认同,影响塑造他

NORTHEAST ASIA FORUM

国政策偏好以增进国家影响力、实现对外政策目标。^[4]国家形象由此成为国家权势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和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依托。当前,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加速转型,各领域全球挑战积聚叠加,作为全球影响力日益提升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坚定树立“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5]对于我国的安全发展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都具有关键影响。2023 年底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总结了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彰显了我国外交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树立了自信自立、胸怀天下、开放包容的大国形象”。^[6]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标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任务,围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条主线,经历前所未有的风险考验,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有力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和正当权益,开创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可以说,自信自立、胸怀天下、开放包容的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树立,既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也是中国在动荡变革世界中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的确定性正向贡献。

一、坚持自信自立,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作为“国家在国际社会印象中的基本精神面貌与政治声誉”,^[7]以及“外部和内部公众对某国的总体判断和社会评价”,^[8]国家形象在国家间以及国家与国际社会间的持续互动实践中产生,由国家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角色身份认知^[9]和国际社会对其话语行动的观念反映共同建构。^[10]换言之,国家形象既是一国对现存国际秩序的基本立场和对外政策原则理念的外在体现,也包含国际社会对该国对外交往实践的认知评价与理解回应。中国学界因而特别关注到,建构良好的国家形象或声誉有助于国家在国际无政府社会更加清晰有效地传达行动意图和行为倾向,^[11]减少彼此误判,进而缓解崛起国面临的体系压力。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下快速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国家身份和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同步变革。从“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到“中国责任论”,中国改革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家形象的构建也遭受诸多误读、扭曲甚至丑化。在此背景下,中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做“负责任大国”,在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中持续推进负责任大国外交理念的创新、发展和成熟。^[12]这实质上是以明确的自我身份认定和稳定的对外政策原则积极回应并主动塑造国际社会对我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和态度,促使国际环境向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

在这一进程中,自信自立、胸怀天下、开放包容的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构建,基于中国独立自主、对外开放、合作共赢的对外政策,并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中国做负责任大国,首先是坚持自信自立对中国人民负责,要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理性认识我国国情国力,在坚定维护发展权益的同时承担合理的国际责任。其次是坚持胸怀天下对国际社会负责,将中国的开放发展与世界的和平繁荣紧密联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合作共赢之路,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公正合理变革,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最后是坚

持开放包容对全人类负责,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最终指向尊重各国发展道路选择、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设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深化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总之,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树立,需要在正视我国发展的成就与挑战的前提下,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认知和对世界秩序的基本理念同国际社会的期待相互平衡,而以自信自立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则是其根本立足点。

(一) 自信自立是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构建的基点

自信自立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炼就的精神气度,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自信自立融入中华民族精神之中,就是中华民族之魂;自信自立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中,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精神支柱;自信自立融入中国外交之中,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鲜明特质。回望中国共产党成立百余年来,经历过千难万险,遇到过各种挑战。但是,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长期实践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既虚心学习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又坚定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信邪、不怕压,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振兴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困难,在千锤百炼中使国家变得愈益强大和成熟起来。

新中国自成立起一直是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发生深刻变革。随着对世界形势研判的调整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对现存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的理念发生重大转变,国际责任观也随之转型。^[13]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将自身的安全与发展同世界的繁荣与稳定密切联系,将战争与革命时代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反帝反殖民斗争的“国际主义”责任,转向在和平与发展时代维护联合国与国际法权威,倡导并奉行多边主义,在国际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坚持互利共赢,做负责任大国。^[14]中国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努力,既反映了我国对自身所处国际地位和肩负国际责任的客观认知,也表明了中国尊重现存国际秩序、遵守国际社会主导规范,^[15]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为维护世界共同利益负责,为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贡献的大国担当。

国际责任的基础是国际贡献与国家利益的统一。^[16]从支援第三世界国家民族民主革命、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努力,到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坚持有所作为,积极回应国际社会期待、扩大对各领域国际制度和国际事务的参与,提出做负责任大国,再到新时代以奋发有为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引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定位不断发展变化,对世界秩序的理念立场日趋成熟,在不同历史阶段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责任观。而无论世界局势如何变幻,坚持自信自立、维护国家核心利益都是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构建的基点。中国一方面从国家核心利益出发,坚定履行与自身国情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将实现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追求国际公平与正义紧密联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全球治理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将对中国人民负责与对国际社会负责、对全人类负责统一起来。

坚持自信自立,中国始终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始终致力于维护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17]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我们就能毫无畏惧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就能坚定不移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18]正是这种以自主谋求发展、在开放中维护自主,坚持走自己的路、以自身的发展壮大为人类进步担当的信心决心,成为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构建的核心支撑,也是中国外交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二)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始终是中国国际责任的核心内容,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美苏冷战对峙的世界格局和风起云涌的亚非拉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中国就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与印度、缅甸等第三世界国家一道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将其确立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这无疑充分展现了战争与革命时代,尚未得到国际社会全面承认的新生社会主义大国,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同时,顺应历史潮流、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积极创造和平国际环境、建立平等国际关系的负责任形象。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没有走西方大国殖民掠夺的老路,摒弃了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和“国强必霸”的霸权思想,选择融入而非挑战既有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写入宪法。这既是中国从近代苦难中自立奋斗得出的必然结论,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正如邓小平指出:“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19]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兴旺,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进一步增强战略自信,履行负责任大国应尽职责,底气更足、信心更强、行动更有力、成就更卓著。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自主探索,成功走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中国给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答案,赋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时俱进的内涵价值。作为体系内迅速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超越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以权力界定利益”和冲突必然性的观念,谋求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破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从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以贯之的是对国与国关系的创新探索,矢志不渝的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担当尽责。^[20]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不为迷雾所惑、不被风浪所阻,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展现把握大势、引领潮流的沉着和智慧。习近平主席先后40多次走出国门,足迹遍及五大洲70多个国家,从高频度出访和接待来访到双边多边、线下线上互动结合,以精彩纷呈的元首外交进行深入战略沟通,为外交全局提供战略引领。我国已经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铁杆朋友和战略支点更加巩固,展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独特风范。

(三) 发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优良传统

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定位,表明坚持和平发展、在现存国际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的立场,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欢迎。然而,尽管“中国融入地区和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合作态度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积极”,^[21]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却对中国在各领域国际事务和国际制度中影响力的提升愈发不安甚至不满。这些国家一方面基于安全困境理论和权力转移理论塑造“修昔底德陷阱”说,渲染“中国威胁论”,认为崛起的中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的努力意在“改变现状”,破坏全球均势和稳定,^[22]最终颠覆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和秩序。另一方面则抛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概念,塑造“中国责任论”,^[23]试图框定中国构建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方向和路径,要求中国承担与自身国情国力和国家利益不符的国际责任,从而增大中国的发展压力,^[24]并最终迫使中国“转型”为符合西方标准并为西方认可的所谓“负责任国家”。

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遏制打压,中国在构建负责任大国形象进程中始终坚持自信自立,既保持对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关系的清醒认知,又坚定通过自身的发展壮大筑牢承担国际责任的基础,在维护发展权利和承担大国责任之间求得平衡。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25]中国外交保持战略定力,发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优良传统,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捍卫正当发展权益。坚决反制任何侵犯我国主权、干涉我国内政的错误行径,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挫败利用台湾、涉疆、涉港、涉藏、涉疫、人权等问题对我国发动的各种攻击抹黑,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矢志不移坚持自主创新,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勇于攻坚克难、追求卓越、赢得胜利,积极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攀登世界科技高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从根本上保障了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提出一系列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全球公共理念、主张、方案,坚定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少数国家垄断国际事务,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权利挺膺担当,以中国铁肩担人类道义,锚定历史前进的正确航向砥砺前行。

二、坚持胸怀天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华文明的血脉基因和精神特质,也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习近平指出,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要展现更多责任担当。^[26]大国之大,不在于体量大、块头大、拳头大,而在于胸襟大、格局大、担当大。^[27]大国要以人类前途命运为要,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担负更大责任。胸怀天下展现的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博大胸襟和坚定的负责任大国担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基本理念。中国外交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国际格局下都坚持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在科学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时代进步潮流的基础上,坚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正确认识和处理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不断为人类发展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特别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权力格局重组交织全球治理体系转型,各领域全球风险累积外溢,民粹主

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显著上升。中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积极引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正是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为狭隘的民族利益和短期需求所惑,以大国担当为世界提供确定性和稳定性,以实际行动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外交胸怀天下的情怀和使命。

(一) 坚持胸怀天下彰显大国责任担当

胸怀天下源于中华民族立己达人、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优秀历史传统。马克思主义是追求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自由解放的学说。作为诞生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28]建党之初,党的先驱们就确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抱负。^[29]建国之初,我国同争取民族解放的亚非拉国家互相同情、互相支持,强调“中国是已经取得胜利的国家,有义务支持那些正在取得胜利和将要取得胜利的国家”。^[30]改革开放后,中国为创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建设和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积极融入世界市场、主动承担应尽的国际责任,提出“使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和富强起来,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这是我们党必须勇敢担负起来的历史任务”。^[31]经济持续发展的中国以宽广胸怀与世界分享发展机遇,以强大的自信为世界持久和平贡献力量,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时任泰国总理川·立派对中国担当“负责任大国”予以高度评价,他赞扬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维护区域金融稳定的作为“是负责任的和正确的,表现了一个泱泱大国的风度”。^[32]

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激荡。中国共产党科学把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势,立足世界各国命运与共的客观现实,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先后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为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各领域全球挑战提供中国方案。面对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推动大国合作、促进全球增长,坚持开放包容、反对封闭排他;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以负责任态度处理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支持“全球南方”团结合作,致力于推动发展议题回归国际议程中心、推动现代化成果公平惠及各国;以自身的发展不断为动荡世界注入确定性,壮大世界和平力量和国际正义力量,为共创人类美好未来贡献正能量,彰显了大国大党深厚的天下情怀和坚定的责任担当。

(二)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和各领域全球性问题积聚联动,各国命运交织,休戚与共。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面临挫折倒退,全球经济发展失衡加剧、地缘政治冲突重现,全球治理理念价值单一、绩效不彰的背景下,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以负责任大国胸怀天下的使命担当,将中国的前途命运与世界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基于地球村时代人类命运与共的客观现实和天下一家的整体共识,直面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人类整体价值危机和文明交流的深层障碍,为开创平等互利的国家间交往新格局,确立共赢共享的全球治理新方案,塑造包容互鉴的文明交流新路径提供了鲜明的中国主张,顺应了世界大势和人心所向,成为中国外交胸怀天下的当代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表明正在跨入全球负责任强国之列

的中国顺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进入新时期、人类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时代要求,^[33]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实现对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道路的历史超越、对全球治理体系霸权化道路的系统超越以及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辩证超越,^[34]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为开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未来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的高度自信。

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出日益强大的影响力、生命力、感召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先后写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安理会、人权理事会的正式决议文件,^[35]其价值意义赢得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众多国际组织的支持与认可,表明中国对当前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方向的观念立场,对人类共同利益共同价值的理念探索,对因应人类共同挑战的现实路径的实践创新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正面回应,并逐渐在国际社会形成共识。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层次,从全球发展、卫生健康、核安全议题到海洋、网络空间,中国已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在多个领域构建了不同形式的命运共同体,更加丰富多维的建设实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以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为实现路径,以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遵循,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支撑,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战略引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6]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国与世界各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世界秩序变革确立了共同努力的大方向,也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树立了崇高目标。特别是面对西方国家基于狭隘国家利益和冷战思维助长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浪潮,以“去风险”为名推进“脱钩断链”,破坏全球多边经贸秩序、干扰各国共同发展进程,中国始终尊重各国对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高目标,引领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成为中国在世界新的动荡变革期践行大国责任的生动实践。

(三) 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随着中国以愈发积极的姿态与各国共同应对各领域全球性挑战,承担治理责任,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贡献逐步由量变达到质变。在不断拓展参与领域和深度的同时,中国一方面立足自身优势,在相关治理领域为国际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中国理念倡议和行动方案、主导创设新型全球和区域治理机制,另一方面则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改革不公正不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安排担当大国责任。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多边治理体系和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积极参与者和重要贡献者,已成为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以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的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已累计派出维和官兵5万余人次,参加25项联合国维和行动,^[36]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中国是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者,更是落实这一重大倡议的行动派。^[37]近年来,中国以实际行动加强全球安全治理,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坚持不干涉内政,反对强加于人;坚持客观公道,反对谋取私利;坚持政治解决,反对使用武力;坚持标本兼治,反对短视片面。^[38]在中方积极斡旋下,伊朗和沙特恢复中断七年的外交关系实现和解。2024年7月23日,巴勒斯坦各派代表在北京签署《关于结束分裂

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有效化解了巴勒斯坦内部结构性矛盾，为巴勒斯坦问题的政治解决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中东地区近期的“和解潮”成为中国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以大国担当主持公道正义、遏制化解冲突暴力的最新实践。

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和全球相互依赖态势复杂演变的背景下，西方主导的现行全球治理体系规则和理念发展滞后，^[39]未能有效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难以解决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世界不确定性日益凸显。面对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的不足，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贡献方案智慧，使之符合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满足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现实需要。中国致力于推动完善经济全球化的治理架构，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增强其有效性和权威性，促进自由贸易，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维护公平竞争，保障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益和空间。聚焦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各国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性多边机制内的对话合作，并主动在周边、地区和全球提出一系列多边合作倡议，在经济复苏、气候变化、环境保护、人文交往、全球安全等领域积极提供物质、制度、观念方面的全球公共产品，推动各国共担治理责任，共促和平发展。

坚持行动导向，促进全球治理更加公平、有效、包容、合理。中国致力于弥合南北发展鸿沟，促进自身发展同世界发展相互成就，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经验，支持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权和发言权，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切实体现国际格局变化，提升其包容性、合法性。通过持续精准的扶贫行动，中国提前十年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实现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的70%以上，为人类减贫事业作出巨大贡献。^[40]中国倡导成立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设立丝路基金、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等，促进全球发展机制改革，培育全球发展动能，提升全球发展韧性，成为促进全球发展治理的中坚力量。面对全球疫情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以及危机冲击下相关治理机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危机，中国在科学保障国内疫情防控水平的同时，积极引领全球抗疫合作和机制协调，推动金砖国家共同为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治理机制提供资金支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移，^[41]为国际社会团结抗疫展现大国担当。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中国以生态治理的显著成效助力全球环境治理，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和清洁发电体系，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贡献国、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对全球绿化增量的贡献居全球首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全球治理的引领者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三、坚持开放包容，促进和深化国际合作共赢

开放包容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源泉，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直接动力。历史和实践证明，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无论是国家发展，还是文明兴盛，都需要开放的胸怀和包容的精神。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同乘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任何人为“筑墙”“脱钩”的行为都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都阻挡历史发展趋势，只有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中

国着眼全球整体利益、顺应时代进步潮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坚定以中国的发展为各国共同发展提供新机遇,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巩固推进互联互通建设普惠各国民生;拓展全球伙伴关系,探索各国平等相待、利益相融,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交往新路;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不封闭守旧,不倡导“文明优越论”,积极寻求多元文明的平等交流与包容互鉴。与不同国家相处,对待不同文明,“我们应该少一点傲慢和偏见、多一些尊重和包容,拥抱世界的丰富多样,努力做到求同存异、取长补短,谋求和谐共处、合作共赢”。^[42]坚持开放包容是新时代中国的鲜明气质和形象,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促进世界各国各文明的和谐共存与共同发展,推动建设开放包容、美美与共的世界,更是中国在世界新的动荡变革期履行大国责任的一贯追求。

(一) 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对外开放是中国长期的基本国策,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进入新时代,中国坚持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稳健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为各国合作提供更多机遇,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注入更多动力。面对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的“逆流逆流”和一些国家实行“脱钩断链”“小院高墙”,中国坚持拆墙而不是筑墙、开放而不是隔绝,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努力消除全球发展中的贸易、投资、技术壁垒。^[43]

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实质上造就并固化了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是当前全球经贸发展不平衡、财富和资源分配不均、经贸治理机制不合理不公正的根源。中国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主张互利共赢是经济全球化的价值目标、是南北方合作的合法性基础,旨在转变当前全球经贸发展不平衡不公正的格局,构建互利合作的全球发展新模式,努力实现各方受益获利的有效治理,增强全球治理的公正性、合理性和持久性。^[44]在维护世界秩序稳定的同时,坚定捍卫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推动世界秩序改良、促进国际分配正义,^[45]这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人类共同价值和整体利益层面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今年以来,中国同安提瓜和巴布达、新加坡、泰国等签署互免签证协定,共同打造跨境人员往来的快捷网络。从广交会到进博会,从服贸会到数贸会,从消博会到链博会,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中国大市场日益成为世界大机遇。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实现在开放中扩大共同利益,在合作中促进机遇共享。

(二)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本身就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和中国外交的顶层设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十多年来,中国坚持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巩固互联互通合作基础,拓展国际合作空间,推进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建设,同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合作文件,举办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立了20多个专业领域多边合作机制,打

造起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也成为共建国家携手发展的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共建国家的发展空间更加宽广。中国已经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也是越来越多国家的主要投资来源国,为全球互联互通、促进发展繁荣注入了强劲动力。

中国不搞排他性小圈子,不搞集团政治、不搞阵营对抗,欢迎一切志同道合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时希望其他国家的互联互通倡议也秉持开放态度,展现敞开大门谋发展、张开怀抱促合作的胸怀和智慧。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复苏,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全球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的时刻,“一带一路”倡议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为指引,主张在共建国家既有的战略规划政策间实现灵活有效的沟通联通,以共同的发展诉求引导各国以包容、务实的合作方式,在治理实践中汇聚行为预期、协调行为模式,探索符合地区现实和自身需要的发展道路。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不强加统一的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不指向在共建国家之间建立一套强制性治理制度规则,也不要求成员国转变为同质行为体。这显然有助于改变世界经济治理规则由少数国家掌控、发展成果被少数国家占有的局面,跨越不同地域、不同文明、不同发展阶段,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和社会制度差异,推动各国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共同繁荣,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46]

(三) 深化拓展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新时代以来,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构建起遍布全球的共同朋友圈。^[47]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大国肩上都承担着特殊责任。国际形势越动荡、风险挑战越突出,大国越需要加强协调合作。中国致力于以连贯一致的方针政策,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深化中俄战略互信和互利合作,夯实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落实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共识,探索形成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密切中欧高层往来和战略沟通,推动中欧关系行稳致远。

中国始终将周边置于外交全局的首要位置,坚持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在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等既有地区合作机制的同时,中国还主导创设上合组织、博鳌论坛等地区多边安全 and 经济合作平台,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一系列地区自由贸易机制的建设与发展,为地区稳定和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通过主动担负深化地区互联互通、促进地区繁荣稳定,提供公共产品、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大国责任,中国以自身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辐射带动周边国家,“为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25]有力回应了西方国家对“搭便车”的批评。

中国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与发展中国家携手同行,与金砖国家团结振兴。从援建坦赞铁路到向亚非拉国家派遣医疗队,从宣布免除对最不发达国家债务到设立气候变

化南南合作基金、对非“十大合作计划”，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维护独立自主斗争中经历相似，在谋求发展振兴道路上命运与共，在追求公道正义目标上立场相近，正在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和世界秩序重塑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支平衡力量。在创造性提出“金砖+”合作理念的基础上，中国同发展中国家不断深化拓展“金砖+”开放合作模式，促成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促进金砖国家敞开大门谋发展、张开怀抱促合作，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展南南合作、实现联合自强的典范。

（四）积极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48]西方文明对人类现代化全球化进程的长期主导不仅塑造了全球经济“中心—边缘”的等级制结构，也导致西方文明观和价值理念的绝对化、普遍化，^[49]丛林法则、零和思维和强权逻辑支配国际关系，非西方的治理理念与现代化路径被压抑，全球文明隔阂和发展失衡日益加剧。中华文化自古就以开放姿态、包容胸怀与其他文明进行交流互鉴，因而成就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天下一家的博大气象。新时代的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以开放心态理解不同国家发展的条件和不同文明生长的环境，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注入动力。倡导中拉“成为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相互促进的典范”，倡导“建设文明共荣之桥，把中欧两大文明连接起来”，推动形成政治安全、经贸财金、人文交流“三轮驱动”的金砖合作架构，推动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构建人文共同体……中国助力世界不同文明的交融共生不断走向深入。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良渚论坛，与希腊共同发起文明古国论坛……中国为不同文明沟通对话搭建平台、创设机制，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这些都是新时代中国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着眼人类美好未来，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在交流中相互沟通学习，汇聚各国各民族的治国理政智慧，提升国际社会解决全球问题的能力，^[50]消除国际社会的文化壁垒和国际交往的精神阻隔，建设开放包容世界的生动体现。

四、结语

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一方面将国家形象中凝结的国家威望与声誉视为权力政治的一个侧面和国家权力的构成要素，一方面将良好的国家形象视为国家消减国际社会疑虑、缓和体系结构压力的手段。但中国构建自信自立、胸怀天下、开放包容的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历史进程表明，无论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如何变迁，中国始终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利益统一起来，把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中，坚定不移地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与义务。作为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国致力于破除以权力政治为中心的冲突性国际关系逻辑，超越零和博弈、集团对抗的冷战思维定式，成为动荡变革世界的稳定力量和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中流砥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51]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树立和巩固负责任大国形象，这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必然要求。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必将以高度战略定力与历史理性,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展现更加鲜明的大国形象、更加非凡的大国气度,一如既往为世界和平安宁、共同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的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 [1] 吴志成.树立自信自立、胸怀天下、开放包容的大国形象[N].人民日报,2024-05-24.
- [2]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M].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5-123.
- [3] 门洪华,周厚虎.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及其传播途径[J].国际观察,2012(1):8.
- [4]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M].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Books, 2004: 1-32.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202.
- [6]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23-12-29.
- [7] 郭树勇.论大国成长中的国际形象[J].国际论坛,2005(6):51.
- [8] 汤光鸿.论国家形象[J].国际问题研究,2004(4):18.
- [9] 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1):10.
- [10] 董青岭.国家形象与国际交往刍议[J].国际政治研究,2006(3):55-56.
- [11] 赵洋.身份叙事与中国参与北极事务身份建构[J].东北亚论坛,2022(1):96.
- [12] 宋伟,齐桐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负责任大国外交理念的创新发展[J].社会科学,2018(9):22-23.
- [13] 周方银.中国的世界秩序理念与国际责任[J].国际经济评论,2011(3):45.
- [14] 蔡拓.当代中国国际定位的若干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2010(5):127.
- [15] Liqun Zhu. The Domestic Source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Diplomacy [C]//Pauline Kerr, Stuart Harris and Yaqing Qin, eds. China's New Diplomac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110.
- [16] 卢静.国际责任与中国外交[J].国际问题研究,2019(5):23.
- [17]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0-21.
- [18]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2-13.
- [19]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58.
- [20] 吴志成.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绽放新的时代光芒[N].光明日报,2024-07-10.
- [21] 江忆恩.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J].国际政治科学,2005(2):26.
- [22] Condoleezza Rice.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J]. Foreign Affairs, 2000(1): 56.
- [23] Robert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EB/OL]. <https://2001-2009.state.gov/s/d/former/zoellick/rem/53682.htm>, 2005-09-21.
- [24] 刘建飞.“中国责任论”考验和平发展[J].现代国际关系,2007(4):23.
- [25]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3,153.
- [26] 习近平.同舟共济克时艰,命运与共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视频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21-04-21.
- [2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46.
- [28]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

- 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1.
- [29] 毛泽东.关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等问题给蔡和森等的信[G]//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21-329.
- [30]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374-375.
- [31]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57.
- [32] 李岚清同泰国总理川·立派会见[N].人民日报,1998-12-05.
- [33] 吴志成,吴宇.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论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3):5.
- [34] 刘同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超越[N].光明日报,2017-09-23.
- [35] 中国理念赢得世界认同[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07-10.
- [36] 许怡真.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力量[N].解放军报,2014-05-30.
- [37] 刘卿.全球安全倡议的理论价值与实践路径[J].东北亚论坛,2022(5):10.
- [38] 王毅.中国坚定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N].人民日报,2024-02-18.
- [39] 秦亚青.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4):4.
- [40] 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N].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04-07.
- [41] Andrew Harmer. The BRICS Countries: A New Force in Global Health[J].Bull World Health Organ, 2014(6):394-395.
- [42] 习近平.同舟共济创造美好未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8-11-18.
- [43] 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N].人民日报,2024-06-28.
- [44] 刘培东,吴志成.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加普惠包容的中国视角[J].南开经济研究,2024(5):10-11.
- [45] 石斌.秩序转型、国际分配正义与新兴大国的历史责任[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12):95-98.
- [4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7-8.
- [4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193.
- [48] 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并发表主旨讲话[N].人民日报,2023-03-16.
- [49] 布雷特·鲍登.文明的帝国:帝国观念的演化[M].杜富祥,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278-279.
- [50] 吴志成,李佳轩.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析论[J].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6):25.
- [5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2.

[责任编辑 许 佳]

ABSTRACTS

On Building China's Image as a Responsible Major Country in the New Era

WANG Ya-qi WU Zhi-cheng · 3 ·

Abstract: Building an image as a responsible major country that is confident, self-reliant, open and inclusive and has a global vision is a historic achievement and change in China's foreign affairs in the new era. Taking confidence and self-reliance as its foundation, adhering to an independent and peaceful foreign policy,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fine tradition of having the courage to fight and being good at fighting, China not only maintains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interests and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but also solidify the foundation for undertaking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through its own development. China maintains a global vision, adds more substance to building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participates in and leads the global governance process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extensive 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and tak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major country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China adheres to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pursues a mutually beneficial strategy of opening up, promotes high-quality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deepens and expands the global partnership network, promotes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guide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owards inclusive development, and promotes win-win cooperation and common development of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China has always placed its own development in the coordinate system of human development, firmly fulfilling its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and has become a stabilizing force for the turbulent and changing world, and a bulwark for promoting historical progress. China will surely make new and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the cause of human progress.

Key Words: Responsible Major Country; National Image; Confident and Self-reliant; Global Vision; Open and Inclusive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the U.S.-Led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XU Xiu-jun CHANG Fang-yu · 16 ·

Abstract: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IPEF) is an initiative proposed b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o compensate for the lack of economic pillars in the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Its main purpose is to establish a Chinese exclusion economic circle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to contain China and leverage the power of allies to drive its own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influenced by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U.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chosen to adopt an executive and modular path to promote the IPEF in order to avoid the impact of partisan struggles in Congress. However, while the executive path has brought convenience, it has also made the IPEF lack legal safeguards, vulnerable to changes in the ruling party and constrained by executive authority to include free trade-related elem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modular path has also caused an imbalance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 Supply Chain Pillar, the Clean Economy Pillar, the Fair Economy Pillar, and the Trade Pillar. Even i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able to make a breakthrough in trade negotiations, the expansion and deepening of the Trade Pillar still needs to be supported by congressional legislation, and ultimately it is still difficult to bypass the constraints of political polarization.

Key Word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IPEF); U.S. Regional Cooperation Arrangement; Executive Path; Modular Path

United States Supply Chain Alliances Formation: Progress, Types, and Prospects

LI Chong CHEN Zhao-yuan · 32 ·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creasing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major countries and global challenges, the scope of alliances has gradually expanded from the conventional military sphere to global governance issues such as supply chains. After the 9/11 attacks, the United States witnessed an accelerated trend towards "alliance-based" international supply chain cooperation: elevating supply chain issues to the security level, identifying certain countries as sources of potential threats to supply chains, and collaborating with its allies to implement collective measures such as export controls, economic sanctions, and investment reviews targeting the supply chains of competitors. During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developed a supply chain alliance framework aimed at achieving "collective resilience," encompassing multiple regions, sectors, and links. There are significant variations in the types of commitments and institutional levels of U.S. supply chain alliances. Supply chain alliances that cover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arget key emerg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semiconductors, and comprise members with strong economic and security ties to the United States usually exhibit operational commitments and higher level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Supply chain alliances are part of the U.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middle class and an important tool to maintain its hegemonic position and strengthen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exerting significant impacts on global supply chain stability, great power games, and the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The U.S. supply chain alliances possess significant potential for further enhancement, and their prospects will be directly affected by the election results.

Key Words: Supply Chain Alliances; Global Governance; China-U.S. Relations; U.S. Diplomacy; Securitization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U.S. Asia-Pacific Strategic System Based on Field Theory

YANG Mei-jiao · 47 ·

Abstract: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in the "time" and "trend"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landscape has undergone key change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U.S. Asia-Pacific strategy has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academia. Based on the model of the field theory, combined with the strategic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ince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dual effects of strong positional advantages and high threat perception have influenced the emergence of the hub-and-spokes system. Weak positional advantages and high threat perception have stimul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inilateral alliance system. Since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U.S. Asia-Pacific strategic architecture has evolved from the hub-and-spokes system to the American-style minilateral "lattice-work" of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hanges in the power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nd the escalation of geopolitical games, the U.S. Asia-Pacific strategy also shows a dual form of change and constancy. The change l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akened positional advantage in the Asia-Pacific, while the constancy is reflected in its continued high degree of threat perception in the Asia-Pacific field, all serving to maintain U.S. hegemony. In view of this, China can effectively respond by optimizing the regional opening layout to strengthen its influence, exploring new models of interaction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the region, and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reby gaining strategic initiative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Key Words: Positional Power; Threat Perception; Field Theory; Hub-and-Spokes System; Lattice-work of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The Important Practice of Building a Regional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nalysis of China-ASEAN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Cooperation

FAN Jia-rui · 62 ·

Abstract: China is leverag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establish a spatial connectivity network by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with neighboring